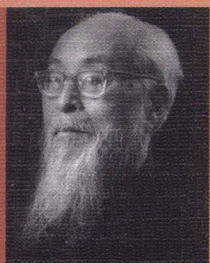


现当代新儒家研究丛书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
方法论研究

高秀昌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出版资助

现当代新儒家研究丛书

主 编 郭齐勇

副主编 高秀昌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

高秀昌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高秀昌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6

(现当代新儒家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7777-8

I. ①冯… II. ①高… III. ①冯友兰(1895~1990)-哲学史-方法论-研究-中国 IV. ①B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6464号

书 名: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

著作责任者: 高秀昌 著

责任编辑: 吴 敏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7777-8/B·092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18.75印张 292千字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作者简介

高秀昌，1962年生，河南邓州人。198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系，2000—2003年在南开大学哲学系，师从方克立教授，攻读中国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冯友兰学术研究会理事，河南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老庄道家研究、冯友兰哲学思想研究以及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著有《哲人的智慧》（1995）、《道家双峰》（合著，2001），注译有《庄子》（合著，2006）、《墨子》（2007），编有《冯友兰学记》（合编，1995）、《旧邦新命——冯友兰研究》（1999）等。

内容简介

本书首次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作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分析研究，着重考察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详细分析了他的哲学史方法论与其哲学观、哲学史观的内在联系，并揭示其价值和意义。

现当代新儒家研究丛书总序

高秀昌教授组织了这一套“现当代新儒家研究”丛书。他很谦虚，一定要我当主编并写几句话。因秀昌是我的老朋友，不便推辞，姑且说几句吧。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之后，国势日颓，清廷腐败无以复加。1905年，科举考试废止；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近一百七十年来，特别是近百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历史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面临东西方列强的瓜分豆剖，中国战乱连连，社会解体，一盘散沙。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百年以来的中国思想的主轴是民族主义思潮，民族的独立和富强是中国百年以来的最大呼声和主要趋势。百年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儒家受到很多误解、误会，人们往往要中国文化、儒家文化来承担中国落后挨打的责任。中国走向了一条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的更新之路，儒学渐趋没落，儒学处在不断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百年儒学中，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方东美、钱穆、张君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为代表的现当代新儒家对儒学贡献很大，他们重新确立了中华文化的精神方向。以上各位的学术思想十分博大，他们之间也有不少差异。

二十年多年以来，方克立教授、汤一介教授、李锦全教授、萧萐父教授等学术界前辈不断推动对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和人物的研究，学者们活跃了关于文化、思想、学术的思考并提出了诸多新问题，配合学界其他学者与其他讨论，萌生了一些问题意识，取得了不少思想成果。

1. 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二元对峙的模式，并由此反省现代性，重新思考东亚精神文明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东亚现代化不仅仅是对西方冲击的被动反应，传统与现代不仅仅是单线递进的关系。东亚诸国的现代化有自身的内发性，是在世界与东亚、世界与中国互动背景下自身的调适与发展的历程。东亚现代化有自身的精神、制度、人才资源。

当代新儒家提出了现代性中的传统、现代性的多元倾向和从民族自身资源中开发出自己的现代性的问题。杜维明指出：“不能只把现代化当作一个全球化的过程，也不能把现代化当作一个同质化的过程，更不能把全球化当作一个西化的过程。正是全球化的意识，使得根源性意识越来越强。也正是这一原因，我们……特别突出现代性中的传统。”现代性在西方诸国有不同的内涵和特质，其在东亚及世界其他地区也应当有不同的形式、内容与精神。当代新儒家充分重视协调世界思潮与民族精神，整合世界性与根源感、现代性与民族本己性。全球化问题在我国大规模地讨论之先，当代新儒家思潮已经提供了不同于启蒙理性的新的思路，率先体认到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不同地域的文明都蕴藏着现代的、普遍的价值，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全球化绝不意味着某一种话语霸权的进一步扩张。在东亚诸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其地域与民族的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已经并将继续起着巨大的多重作用，在一定层次或程度上创造并丰富着现代化、现代性的新模式。

2. “文明对话”与“文化中国”。梁漱溟在新文化运动末期已经开始了跨文化比较与对话的工作，虽不免粗疏，却代表了一种思路。唐君毅起草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联署的1958年《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虽因强调一本性而遭到不少批评，但平心而论，他们的《宣言》和其他丰富的有高度学术水准的论著、讲学，具有深刻的意义。现代新儒家为跨文化比较、对话和融合做了大量的工作。文明冲突在历史上和现时代已屡见不鲜，唯其如此，文明对话与沟通才尤显重要。文明对话与沟通如何可能呢？首先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自觉自识。如果某种非西方文明或所有的非西方文明失掉了本己性，成为强势文明的附庸，恰恰使文明对话成为不可能之事。第三代新儒家更强调开放性。杜维明指出：“文化与文化的交流，不是零和游戏，不必采取你争我夺的方式，越交流双方的资源就越多。如果以发扬传统精致文化为基础，和西方深刻的价值进行沟通，我们应向两方面开放，要向当代西方而不是狭隘意义上的工具理性和只突出富强价值的西方，而是当代西方之所以成为西方的精神源头充分开放。要了解基督教、犹太教、回教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所起的积极作用，了解古希腊的哲学智慧，了解中世纪的发展对西方的影响。”“文化中国”的问题虽然并非当代新儒家首倡，海内外各方面学者均有论述，但近年来以杜先生阐释最多。事实上，除了地理中国、政治中

国、经济中国、军事中国之外,确实有受中国文化不同程度浸润或影响的地域与人群,谓之为“文化中国”未尝不可。这些地域与人群的现代生存样态、价值意识、思维方式、心理结构,的确与多元性的中国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整个世界未来的多元、良性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3. 儒家价值与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宗教、文化学者非常关注世界伦理的问题。这显然必须调动世界各宗教、文化、伦理的资源。鉴于当代纷争的世界需要取得伦理共识与普遍和谐的相处之道,1993年,天主教背景的孔汉斯(Hans Kung)教授起草的《世界伦理宣言》为不同宗教的代表所签署。该宣言把包括孔子在内的、世界上各文明、各宗教的原创性的思想家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放到了重要的地位。孔子的这一思想有助于国家间、宗教间、民族间、社群间、个体间的相互尊重,彼此理解与沟通。《世界伦理宣言》能否为联合国所通过,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有关此问题的热烈讨论,实属客观需要、大势所趋、理所当然。当代新儒家学者努力参与了全球伦理的建构。刘述先在這一背景下阐扬儒家的“为己之学”及“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的现代意义。他尤以宋儒“理一分殊”的睿识,来解决既尊重差别又平等互待的问题,并接通传统与现代、一元与多元。调动儒家资源来参与新的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的建构亦已成为热点。《中庸》中天、地、人、物各尽其性的原则为历代儒家所重视,这的确是生态与生命伦理的一个重要的生长点。“尽己性、人性、物性即是让天地万物各遂其性,各适其情,即是参赞天道,反之,参赞天道即在于能使自己、他人和天地万物都得到充分的生长发展,得以各尽其性分。”儒家主张“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儒学中的自律、仁爱、不伤害、公义原则等,均有重大的价值和世界意义。

4. 儒学与现代民主政治,与自由主义的关系。现代新儒家的三代代表人物都重视接纳西方近世以降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价值,多有创获。他们在政治诉求上并不保守,在民主政治的理念与制度建设(例如宪政)上,在以德抗位,批评权威方面绝不亚于自由主义者(例如胡适)。梁漱溟、张君勱、徐复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在理论上也有不少建树。自孔孟以来,儒家的政治主张与道德原则相配合,其中可以作为现代民主政治之资源的颇为不少。对政治化的儒学也不必一概否定,而需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儒学的经世原则,对

社会政治的参与与批评,民贵君轻思想,及历史上与之相应的结构、制度,均不能一言以蔽之,咒曰“肮脏的马厩”。对民间社会、言论空间,道统、学统、政统、治统的相对制衡,新儒家多有发挥。关于本土政治、法律资源的开发,关于“儒家自由主义”的概念,学术界有多方面的讨论,亦成为当代新儒学的又一向度。我以为,就自由主义者必须具有的独立的批评能力和精神,必须具有的道德勇气、担当精神而言,就自由、理性、正义、友爱、宽容、人格独立与尊严等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而言,就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空间、道德社群而言,就消极自由层面的分权、制衡、监督机制和积极自由层面的道德主体性而言,儒家社会与儒家学理都有可供转化和沟通的丰富资源。

5. 儒学的宗教性与超越性。这是第二、三代当代新儒家的理论创识。当代新儒家学者不是从制度仪轨的层面而是从精神信念、存在体验的层面肯定儒学具有宗教性的。性与天道的思想亦即儒家的宗教哲学。安身立命的“为己之学”具有伦理宗教的意义。儒家的“天”与“天道”既是超越的,又流行于世间,并未把超越与内在打成两概。关于当代新儒家的“超越内在”说,海内外学者都有不少批评,以为“超越”不能同时是“内在”的。但现当代新儒家与传统儒家在基本品格上是一致的,他们更为关心的不是认识论,而是价值论、本体论问题。这样,“超越”一词也不是在认识论上讲的,而是从本体一境界论上去讲的。所谓的“超越性”指的是神性、宗教性,又可以表示现实性与理想性或者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的张力。依据“天人合一”这样一种理念,高高在上的天道与人的“良知”、“本心”是相通不隔的,如果“天道”、“天”具有神性,那么,说人之“良知”、“本心”也因此获得神性,应是能够成立的。为何在儒家看来,“宇宙心灵”和“个体心灵”可以浑化为一,原来,所谓“天”,是具有神性意义的天和义理之天,并不是指的外在于人的自在之物,而“天”也是一个本体一价值论的概念,其认识论意味是十分淡薄的。如果从认识论角度来看“尽心、知性、知天”,又把天看成外在的客观存在,便显得难以理解,像“心外无物”这样的说法就只能是疯话了。超越性与宗教性虽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但是在现当代新儒家的心目中,二者是相通的。因为,超越的“天”完全没有认识论意味,而只是价值之源。如果超越性被理解为神性、宗教性,而天人又是相通不隔的,那么,以“内在超越”来解释传统儒家的思想便不是不可理解了。换句话说,超越的价值理想追

求,可以通过人的修身增德而在充满人间烟火的红尘中实现。这样一种超越,的确与西学中的超越有所不同。它不需要也很难得到认识论意义上的、实证主义方式的“证实”,而需要的是儒者的身体力行,自证自信。

此外还有许多问题,例如儒学的草根性或者儒学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儒学与女性主义的关系等等,都为当代新儒家所关注。

现当代新儒家是在文化失范、意义危机的时代应运而生的思潮、流派,在不同时期针对中外不同的思想文化问题,其论域亦在不断改变。总体而言,这一流派继承光大了中国人文精神,对世界现代病提出了中国人的批评反省。目前西方人文学界的主潮不再是针对“神性”,而是针对“物性”,即针对着科技和商业高度发展所导致的“物”的泛滥和“人”的异化而展开批判。例如宗教人文主义认为,近代以来的文明社会,带来了人的精神的世俗化与物化,使人的高级的精神生活、灵性生活的品质日益下降。马利坦(Maritain)批判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类中心主义,使人逐渐离开了神与神圣性,这是人自身的堕落的开始,主张回到人与神的合作,以拯救人的堕落。这是要借助宗教精神来避免人的再度沦落(即功利化、工具化、异己化、物化)。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思潮所批评的,正是科技至上导致的“工具理性”的过渡膨胀或“理性的暴虐”对人的奴役。唐君毅先生曾经指出,现代人所面临的荒谬处境是“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中华人文精神,特别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它强调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可能导致一种对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坏;它强调人文建构,批评迷信,但决不消解对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终极的信念与信仰。儒家甚至主张人性、物性中均有神性,人必须尊重人、物(乃至草木、鸟兽、瓦石),乃至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至诚如神,体悟此心即天心,即可以达到一种精神的境界。儒家并不脱离生活世界、日用伦常,相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寻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会政治、科技发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开展。通过当代新儒家的弘扬,中华人文精神完全可以与西学、与现代文明相配合。它不反对宗教,不反对自然,也不反对科技,它可以弥补宗教、科技的偏弊,与自然相和谐,因而求得人文与宗教、与科技、与自然调适上遂地健康发展。

当代新儒家阵营正在分化、重组的过程中,有“新儒家”与“新儒学”

之辨,有“知识”与“价值”的二分,也有“后牟宗三”、“后新儒学”的崛起。海峡两岸的儒家学者在互动中彼此靠拢、位移的事也多有发生。新儒家学者的关切也有所区别。杜维明、刘述先关心儒家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对话。杜维明重视的是儒学作为世界文化的一种精神资源对于现代人生活和西方、全球之可能产生的影响。刘述先认为,当代新儒家由道统的承担转移到学统的开拓、政统的关怀。成中英强调,应当以批判的理性而不是内在的体验为方法,在客观性的基础上建立知识而不是在主体体验的基础上印证价值,应以知识探讨为价值判断、选择或重建之基础,而不是先肯定价值,再寻求知识手段以实现价值理想。

中国大陆学者更重视包括儒、释、道等在内的多种精神资源的开发及对于时代课题、制度建构、民间社会、日常生活和世界现实多重问题的回应。新儒家的研究大有裨益于思想界的健康发展及与世界上各思潮的对话、沟通。最后,我相信,这一研究将有助于活化中国传统的精神遗产,促进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互动,养育出有根基的思想大师。

人文、人性的价值,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价值是长久的,根本的。这里有本末的关系,不可颠倒。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生动活泼的、适合不同年龄孩子的人性的教育,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价值观、做人做事底线与终极信仰的教育,而这对于国家民族的长久利益,对现代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公民底线伦理与伦理共识的建构,意义十分重大。孟子早就说过:“徒善不可以行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健康的现代社会的建构,光靠法是不行的,一定要有文化认同、伦理共识、终极信仰的支撑与配合。

做什么人,培养什么人,是根本。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手段。我们不仅希望学校师长,更呼吁整个社会都来整齐风俗,移风易俗;教师、白领、公务员宜正心诚意,洁身自好,坚持做人的底线,并用心去做好人性、心性、性情的教育。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价值来美政美俗、养心养性是历史上儒家教育的传统,值得我们借鉴,将其用于今天公民社会之公民道德的建设。

本套丛书,包括我与龚建平教授合著的《梁漱溟哲学思想》、景海峰教授的《熊十力哲学研究》、高秀昌教授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蒋国保与余秉颐教授合著的《方东美哲学思想研究》、颜炳罡教授的《整合与重铸——牟宗三哲学思想研究》和单波教授的《心通九境——唐君毅哲学的精神空间》,共六种。通过这些著作,我们大体上可

以了解现代大儒的大智慧。高教授的新著首次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作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分析研究,着重考察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形成和发展,及其与冯先生哲学观、哲学史研究成果的内在联系,并揭示了它的价值和意义。其他五种分别对论主及其思想作了全面的梳理,均是若干年前成熟的优秀著作的修订再版本,此次修订提高了水准,此次再版满足了读者的需要。

我们要进一步在民间推动和重整儒学与当代新儒学,积极推动传统的人文教育,尽心尽力把儒学基本价值、终极信念推进到全社会,影响更多的后人。我们要动心忍性,以扎实的工夫,来担当起这一重大责任,承继现当代新儒家诸先生的志业而奋力前进!

衷心感谢北京大学出版出版这套丛书,感谢吴敏女士与她的同事们的辛苦操劳。

是为序。

郭齐勇

己丑年大雪节

自序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之所以要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为题,主要是出于这样的认识: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的百年回顾与展望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主导性话语;而关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反思与探索已经成为深化、拓展中国哲学史研究和重写中国哲学史的根本途径;人们希望通过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为重写中国哲学史、为创立新的中国哲学体系提供新的方法论支持。冯友兰作为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他一生的哲学探索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创立、为中国哲学的创新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自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冯友兰学术思想研究(简称“冯学”)已成为显学,并且成为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有关“冯学”的研究多集中于新理学哲学体系、人生境界说和文化观等方面,而对作为“冯学”重要内容之一的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研究却比较薄弱。从已经出版、发表的论著看,海内外哲学界对冯友兰的“正的方法”(逻辑分析方法)与“负的方法”(直觉主义方法)、“照着讲”与“接着讲”、“释古”方法、“抽象继承法”等作了一定的阐释,例如,涂又光、田文军等对冯友兰新理学方法论所作的分析,金春峰、陈来、宋志明、吴根友、景海峰、柴文华等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以及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论析,胡军、张斌峰、陈鹏等对冯友兰逻辑分析方法的解说,张岱年、黄楠森、羊涤生等对冯友兰“抽象继承法”所作的诠释,李慎之、朱伯崑等对冯友兰“照着讲”与“接着讲”的解释和发挥。这些研究都肯定了冯友兰在探索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绩,以及为推进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近代化、现代化所作出的贡献,并指出了他在建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上所存在的问题。但是,这些研究成果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未能以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为专题,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

方法论思想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正是有鉴于此,笔者试图以冯友兰为个案,通过对冯友兰的哲学史方法论思想作尽可能全面而深入的分析研究,对20世纪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进行比较系统的总结和反思,并进一步探索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这不仅可以推进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促进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研究和拓展,而且还会为重写中国哲学史、为实现中国哲学的理论创新提供方法论的支持。

于是我在方克立先生的指导下,在南开大学哲学系,经过三年(2000—2003)的艰苦努力,完成了这篇博士论文(如果从1992年发表第一篇研究冯友兰的论文到博士论文的完成,对“冯学”的研究已超过十年)。论文得到了校外评审专家朱伯崑、陈来、蒙培元、崔大华、田文军、周桂钿、宋志明诸位先生肯定性的评价。北京大学哲学系朱伯崑教授认为:该文“选题很有学术价值,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颇有理论意义。”陈来教授认为:“论文是学术界首次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写作的方法论进行全面深入理论研究的成果。”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崔大华研究员指出:“本论文具有创造性的学术表现,我以为有两点比较突出:第一,本论文以冯先生完整的学术生平为线索,审视他的每个学术时期的主要哲学著作,从哲学观、哲学史观、哲学史方法论不同层面,渐进地推展出他不同时期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观点的重要内容和特色,显示出初步提出、确立、深化、拓展、综合的演变过程。这一论述的理论框架和逻辑思路,我以为是合理的,有创意的。第二,本论文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总体特色概括为保持高度的方法论自觉,力图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西方哲学的方法和马克思主要哲学的方法之间,在哲学方法和历史学、科学方法之间融会贯通,我认为是很准确的,有见地的;对冯先生学术生平各时期所提出的方法论观点、命题的发掘是很周全的,阐发也是较好的。”诸位先生在积极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论文存在的不足之处。于是,我依照诸位先生的意见,针对论文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和补充。

苦于没有经费支持,所以书稿一直放在书架上,迟迟不能面世。庆幸的是,虽然书不能出版,但是书中的一些章节经过认真修改作为论文陆续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这些论文主要包括:《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冯友兰先生晚年的哲学观》(《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1

期),《“接着讲”——一种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中州学刊》2003年第2期),《试论30年代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南开学报》2003年第4期),《论二三十年代冯友兰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南开学报》2004年第4期),《论冯友兰“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孔子研究》2005年第4期),《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中州学刊》2007年第3期),《冯友兰“抽象继承法”新论——兼论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中国哲学史》2007年第3期),《论冯友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中学西范”依然是治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模式》(《光明日报》2004年3月2日),《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光明日报》2005年5月17日),《中国哲学史研究应以人文主义方法为主导》(《光明日报》2006年6月19日),《中国哲学研究应充分运用逻辑分析方法——论冯友兰对逻辑分析方法的援引与创新》(《光明日报》2007年7月31日)。之所以一一列出这些已经发表的论文,主要是想借本书出版之际,感谢这些报刊曾经给予的帮助和支持。为了凸显我对冯友兰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研究的轨迹,选择了几篇以往所发表的相关文章放在附录中,作为正文之补充。

在拙著即将面世之际,首先要感谢导师方克立先生。2000年秋,我有幸步入南开大学哲学系,师从方克立先生。在这三年跟先生近距离的接触中,他那“学行并进、德业双修”的人格风范,时时激励、鞭策着我,在人生与学业上奋发进取、不断前行。忘不了,在每次会面中,先生精心的传道、授业、解惑;忘不了,在多次电话求教中,先生的热心指导;尤其忘不了,在北京医院的病床前,先生的悉心教诲;也忘不了,先生对我和我家人生活的关心……此景此情,令我终生难忘。对于先生在指导我的论文过程中所耗费的大量心血和精力,我实在是难以用语言表达我真挚的感激之情。在此还想提及的是,我于2008年3月,将书稿寄给任继愈先生,并附信恳请任先生能够拨冗为本书题写书名。尽管任先生没有给我回信(后来知道,任先生身体不好,已不能提笔写字),但是任先生还是通过电话告诉方先生,说我的这本书对于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系统研究颇有价值,可以出版。为此,方先生特地打电话来,告诉我任先生的嘉许之词。我很感动,电话中,恳请方先生转达我对任先生谢意。

感谢校外评审专家朱伯崑、陈来、蒙培元、崔大华、田文军、周桂钿、宋志明诸位先生,感谢宗璞、郭齐勇、李存山、杨国荣、景海峰、陈少明、周德丰、吕希晨、赵景来诸位先生,感谢已经仙逝的张岱年、任继愈、萧萐父、刘文英、蔡仲德诸位先生,在我治学的道路上,他们曾以不同的方式给予我热心的指导和帮助。还要感谢台湾中央研究院刘述先先生、台湾东海大学蔡仁厚先生,他们给我寄来了热情的信函及相关的研究资料。

感谢我的爱妻陈予枝女士,是她热切的鼓励和热心的支持,特别是她辛勤地操持家务,相夫教子,使我得以安心地从事我心爱的哲学研究事业。

最后,还要感谢所有培养过、帮助过我的人们。

高秀昌

2009年11月27日

现当代新儒家研究丛书

梁漱溟哲学思想 郭齐勇、龚建平

熊十力哲学研究 景海峰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 高秀昌

方东美哲学思想研究 蒋国保、余秉颐

整合与重铸——牟宗三哲学思想研究 颜炳罡

心通九境——唐君毅哲学的精神空间 单波

更多北大版哲学图书请访问豆瓣小组：

<http://www.douban.com/group/i-think/>

更多北大版文学图书请访问豆瓣小组：

<http://www.douban.com/group/214837>

更多北大版历史图书请访问豆瓣小组：

<http://www.douban.com/group/41762>

更多北大版艺术图书请访问豆瓣小组：

<http://www.douban.com/group/215329>

目 录

现当代新儒家研究丛书总序	(1)
自 序	(9)
第一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初步提出	
——从《天人损益论》到《人生哲学》	(1)
一 《天人损益论》的哲学史方法论思想	(2)
1. 哲学观	(3)
2. 哲学史观	(5)
3. 哲学史研究方法	(7)
二 《人生哲学》的哲学史方法论思想	(10)
1. 哲学观	(12)
2. 哲学史观	(14)
3. 哲学史研究方法	(15)
三 余论	(18)
第二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真正确立	
——两卷本《中国哲学史》	(20)
一 《中国哲学史》时期的哲学观	(20)
1. 哲学的内容与范围	(21)
2. 哲学的性质	(24)
3. 哲学的功用、价值	(26)
二 《中国哲学史》时期的哲学史观	(28)
1. 两种“哲学史”	(28)
2. 哲学史的目的和任务	(31)
3. 中国哲学史分期	(32)